一部探讨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力作

——戚其章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

胡绳武　桑咸之

戚其章同志所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最近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们展卷阅读，感到十分欣喜。建国以来，近代思想史、近代哲学史、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发表不下一、二十种。近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时有专著出版，历史人物的活动和思想研究方面的书籍，则更多了。然而，近代社会思潮的著作则较少见。戚其章同志此书是一部探讨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力作。它接触到近代历史的重大课题，倾注了作者不少的心血，书中颇多新的见解，是科学研究的一项丰硕成果。

什么叫近代社会思潮？作者说："是指发生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性质的思潮。"根据这一界定，作者依序叙述了四种思潮：海防思潮、洋务思潮、维新变法思潮、民主革命思潮。这一构架大体上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发展的基本脉络。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抵御英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撰写了《筹海篇》。戚其章同志将这段历史的社会思潮命名为海防思潮。这一概括颇为新颖。海防思潮的出现是中国人民对西方国家入侵所造成的一种回应和反响。封建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冲破了闭关自守的心态，改变了传统的夷夏观，以寰球为全局，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向国人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地理和历史知识，出现了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楠的《海国四说》、姚莹的《康辅纪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一批专著。一方面，他们要求学习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另一方面，认识到中国建设海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一思潮标志着封建士大夫的先进群体开始走出中世纪，向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鸦片战争失败，国人反映并不强烈，人们的思想还处于一种蒙昧和朦胧的状态。海防思潮在整个社会上并未发生足够的影响。直到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敏锐的知识分子所撰写的具有海防思想的著作才引起洋务派左宗棠、早期维新派王韬和维新派康有为等人的极大关注。

洋务思潮与海防思潮是相衔接的。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原则，冯桂芬撰写了《采西学议》、《制洋器议》，这原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殷切愿望，洋务派则将这些愿望付诸了实践。他们办起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将西方大机器生产移植到中国这块封建王国的土地上来。作者对洋务派的"变局"论，对自强、求富口号的提出，对本末论、道器论、体用论的讨论等，一一追根寻源，钩稽史料，理出头绪，既理清了思想的起源、演变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又结合大量史实，阐明了这些思想在社会实践中所起的作用，颇见工力。尤其是对本末论、道器论、体用论的分析，这实际上是一个学习西学与中学的关系问题。洋务派学习西学，开始是学船坚炮利，接着范围逐渐扩大，内容逐渐丰富，诸如外交（国际公法）、商务（对外贸易）、教育（设国文馆、派遣留学生出国）等。人们便产生一个问题：政治制度、伦理道德观念能不能学习？中学应放在什

么位置？洋务派以中学为本、为道、为体来回答这一问题。君主制和与之相联系的三纲五常伦理观念是亘久不变的，不能改动。而西学为末、为器、为用，用它来辅助封建统治，是有益的。这样，只有用中本西末，中道西器、中体西用的表达方式才能在高傲自尊的封建士大夫中得到认同，才能为西学争得一席之地，才能在具有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人中间心态得到平衡。

关于早期维新派，史学界有一种看法，即认为不必分早期维新派，他们都可以笼统地归为洋务知识分子。戚其章同志坚持区别早期维新派，而且，进一步分析了他们同洋务派的思想分野。作者认为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在三个问题的认识上是有差异的。第一、对本末论、道器论的认识：洋务派一般地是指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对本末关系的观察是静止的，截然对立的，认为本末是不可改变的，而且强调以图末为重要。早期维新派则指出同一事物本身具有不同因素，如西国自身也有本有末，对本末的观察是对立统一的，是本中有末，末中有本，本末是相互起作用的，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他们提出以治本为先的主张。第二、对西方议院的认识，洋务派多数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早期维新派则从介绍议院优点进而主张在中国试行。第三、对官督商办的态度，洋务派是主持者，早期维新派开始持支持态度，后来，其腐朽性日益暴露，他们又对其提出猛烈的批评，大声疾呼发展民办企业。作者用了很大篇幅剖析了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思想的异同，颇有见地。这些评论成为该书精彩的篇章。早期维新派这些敏锐的观察和深邃的见解为维新派的变法思想的兴起作了很好的铺垫。应当指出：早期维新派虽然政见涉及面很广，但是他们从总体上来看，都未能成一家之言，而且，还未曾叩开西方政治学说的大门。

维新派学习西方的重点在“改制”，即改革政治制度。他们试图将封建君主制改变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于是，他们结成团体，组织社团，介绍西方社会的政治学说。他们介绍西方政治学说时，常从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穿着古代的服装扮演着近代的角色。他们将今文经学中的公羊三世说和西方的进化论附会起来，将礼记中的“选贤与能”和西方民主选举加以对比，将民本、民贵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联系起来考察，将佛学中的慈悲、普渡众生、众生平等和西方的博爱、平等相类比。这是一种中西会通论。这样，一方面可以顺利地“援西入儒”，使儒学与近代化接轨，另一方面又能使“布衣改制”，减轻些来自顽固派的思想压力。作者对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的重要著作逐一加以分析，对他们的思想及其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加以评价，论述时忠于原著，概括主要思想十分严谨，将思潮的来龙去脉叙述得很清楚，具有科学性和深度。如分析谭嗣同的道器论，谭认为器变，道亦可变。这一命题与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相对立，而与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的思想相通。他应用王船山的道器论加以论证、发挥，延伸到政治领域，得出政治制度和伦理观念也可改变的论断。他比郑观应的道器论又迈进了一大步。

作者专辟一节讨论维新变法思潮与中体西用论。作者指出维新派的中体西用是会通论，其目的是要为他们推行的资本主义改革寻找一条通行的途径。其会通必然扩大到中西政治的会通。其实，维新派公开批评洋务派学西方只是袭其皮毛，未抓政法之本。康有为说：“只知变事，不知变法”，严复说：“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并说西国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认识相当深刻。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中体西用作了系统的综合和分析。近年来在传统文化的讨论中，有人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从文化角度抽象地、不恰当地拔高。作者严格按照当时的政治环境，各派争论的焦点，指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是补救论，其主要倾向是维护封建统治，反对维新派的民权观，其实质是抵制维新变法的。戊戌以后，严复对中体西用曾讥笑为

"牛体马用",不伦不类。梁启超评价《劝学篇》说:"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自由书》)全是贬词。

戊戌变法时期,知识分子对君主还十分眷恋。1898 年一位湖南长沙的读者向《湘报》写信,说他读了梁启超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了解到三世六别政体的演变过程,其感想是:"世变之大则有无焉,吾不敢知,吾知吾君之不可弃而已。君主为民主,将置我君于何地也。"(《湘报》第 28 号)不敢弃君,拥护皇帝,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这一观念十分牢固。

维新变法思潮与民主革命思潮在时间上是交错的。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公车上书,维新变法思潮兴起。根据作者分析: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形成于 1895 年,这是民主革命思潮的源头。作者也指出:维新变法思潮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并未停止其发展,仍在延伸,史学界有人认为 1903 年才开始衰落下去。这两股思潮自有其不同点,但是,也有相同之处;互相影响,互相吸引,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

革命派登上政治舞台,要求推翻清朝皇帝,建立民国。他们结成政党,联络学生、新军、会党,动员了广泛的社会层面,他们不象维新派那样披着古代服装表达思想,而是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地宣传民主革命思潮。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01 年《国民报》上有一篇《说国民》的文章,一开头便写道:"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 曰:可。"(《国民报》第 1 期,时论,《二十世纪之中国》,第 9 页)斩钉截铁地否定了君主存在的价值。这一认识与维新派拥戴皇帝的观念相比较,则是思想上的一大飞跃。

作者对于民主革命思潮,着重分析了孙中山思想发展过程。对于孙中山到底见着李鸿章没有? 檀香山兴中会有没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秘密誓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形成于何时等问题,作者都有所考订并提出自己的见解。通观全章,确实可看出民主革命思潮的发展趋向。但与该书前几章相较,则显得较为薄弱。一则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国际国内的环境分析不够,使人看不到民主革命思潮出现的广阔的历史背景。再则,作为一个社会思潮的出现,一定有一个社会群体,有一群代表人物,如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有邹容、章太炎、陈天华、蔡元培、章士钊、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冯自由、朱执信、廖仲恺、马君武、刘师培、吴樾、陶成章、秋瑾、鲁迅、陈独秀等人,他们的思想构成了民主革命思潮的方方面面,需要加以展开分析。第三,这一时期,人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已有发生怀疑的了,如对私有制经济,有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国家政权,有人宣传无政府主义;对于西方文化,有人不主张全盘西化,提倡国粹主义,其内容与顽固守旧思想并不相同;对于伦理道德,有人认为既要学习西方民主观念,又要保留传统文化伦理中的优秀部分;对于人的主体意识,有人谈到国民性的改造、工农普及教育,涉及到如何提高国民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以适应政治体制的改革。总之,民主革命思潮引起了学术风气、社会习俗、价值取向的蜕变。这些丰富内容需要爬梳史料,细缕头绪,就其荦荦大端,从容评论。从 1915 年新文化运动到 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激进民主主义者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这一思潮从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思潮中已初露端倪,都可找到其源头。因此,我们联想到作者在全书结尾应有一个总结,将四种思潮的起伏、消长、演变连串起来评论,并可前瞻,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潮相衔接,这样,则对读者更有益了。

此书的结构是以社会思潮为主线,将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抽出其基本思想进行综合分析,并将这种思潮放到具体的社会活动、重大历史事件中加以检验,论证它们所发生的社会效应,进而评论它的历史作用。全书史料丰富、翔实,分析论证条理清晰,在一些难点较大

的问题上，或者说史学界有争论的问题，作者经过慎密的判断和思考，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诠释。

以上意见是我们拜读了戚其章同志的大作后引起的一些感觉、联想和思考，粗浅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主要是想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引起读者的重视和兴趣，此书值得一读。

（上接第 103 页）

相互吸纳、作用。满族文化的这种特殊性对清朝的统一，以及入关后对广袤疆域的长期而有效治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意大利学者斯达理和俄国学者庞晓梅分别就满族文化问题发表意见。

一些论文指出，入关后满族迅速汉化，这是历史的进步。邓天红则强调说，这种汉化是被改造后的新条件下的“汉化”，它也包括满族文化的突出贡献，而不能简单的以落后归并于先进为结论。

此外也有一些文章从社会学、城市学进行研讨的。隐士及秘密会社既有社会学的意义又有政治学意义，已往论述不多，此次会议何龄修、岑大利等分别进行专题阐述，颇多新见。

此次讨论会涉及到的专题人物有努尔哈赤、皇太极、崇祯帝、范文程、阿桂、刘兴祚和慈禧等。